

世纪之交语境中的 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HIJI ZHIJIAO YUJING ZHONG DE

XIN XIANSI ZHUYI XIAOSHUO YANJIU

杨立元◎著

这部专著审美视野宏阔、涉猎范围广，内容翔实、形式新颖、语言简洁、可读性较强。它不仅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做了全面深刻的学术性总结，给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续写提供了重要参照，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档案性的材料，同时也会对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世纪之交语境中的 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S

HIJI ZHIJIAO YUJING ZHONG DE

XIN XIANSI ZHUYI XIAOSHUO YANJIU

杨立元◎著

这部专著审美视野宏阔、涉猎范围广，内容翔实、形式新颖、语言简洁、可读性较强。它不仅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做了全面深刻的学术性总结，给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续写提供了重要参照，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档案性的材料，同时也会对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 杨立元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34-7027-1

I. ①世… II. ①杨… III. ①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409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23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7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总论	1
一、贴近生活，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	2
二、贴近群众，与人民“分享艰难”	6
三、贴近实际，深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矛盾的深层	11
四、立足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	20
五、兼收并蓄，积极吸纳汲取其他创作方法的优长	23
第二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出现的历史语境	29
一、新现实主义小说是世纪之交历史语境中的必然产物	29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33
三、新现实主义小说是文学与现实合理关系的必然寻找	35
四、新现实主义小说出现的必然意义	39
第三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品格	43
一、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对“改革文学”的继承和超越	43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对“新写实”的纠正和批判	47
三、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对“先锋文学”的反拨和扬弃	53
第四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新质	58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化	58
二、现实主义精神的进化	62
三、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66

四、现实主义精神的美化	72
第五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76
一、关注现实 直面人生	77
二、拒绝卑俗 寻找美好	79
三、暴露弊端 推举崇高	82
四、同情弱小 批判丑恶	86
五、提高现实 展示未来	89
第六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形态	93
一、真实、深入地展现改革主战场的艰难进程	93
二、尖锐、透彻地表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和艰难	96
三、细腻、传神地描绘官场内部的形色声相	100
四、深刻、关切地反映下岗人的生活境况	103
五、生活的无奈与精神的追求：打工者的悲悯人生	106
第七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人文精神的审美向度	112
一、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话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 有着不同的要义和范畴	112
二、“分享艰难”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创作观	115
三、“分享艰难”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延续	118
四、新现实主义小说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123
第八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深刻的理性力量	131
一、理性力量表现在对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和破解上	131
二、理性力量表现在深刻的批判力上	136
三、深刻的理性力量的来源	140
第九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忠于现实的写实风格	145
一、真实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存在的基础和根本	145
二、“当下”性与审美性的深度契合	146
三、深入生活与亲近人民的高度融合	151
四、表现生活实相与深化现实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	153

五、现实性与理想性有机妙合	156
第十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儒家“和”文化的表现	160
一、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和”文化的创作观	161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和”文化的表现	163
三、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和”文化因素的现实意义	168
第十一章 新乡村小说的审美特征及表现	174
一、表现农民在历史变迁中命运的变化和观念的更移	175
二、深刻地揭示了乡村文明的衰落和揭露乡村政权的腐败	178
三、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新质的农民和乡镇干部形象	183
四、新乡村小说的艺术表现形态	188
第十二章 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	193
一、在困境中苦斗、奋争：社会转型期领导者的艰难命运	194
二、用生命和热血换取人间正义：反腐斗士的牺牲精神	199
三、与人民群众同忧共难：乡镇干部的心灵指向	206
四、开拓美好的精神家园：当代农民的精神追求	208
五、在下岗中升华生命的价值：下岗工人失业不矢志	213
六、财富的富有和精神的匮乏：腐败者的二律背反	217
第十三章 变化多样的表现手法	222
一、以“平视角度”观照和呈现生活	222
二、以多样化的手法描绘和表现世相	224
三、以鲜明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烘托氛围	227
四、以多样的叙事方式构建了作品	233
五、具有悲壮的崇高美	237
六、以现代的艺术技巧美化作品	240
第十四章 冷峻质朴的语言特色	249
一、客观真实	249
二、冷峻沉郁	251
三、质朴生动	254

四、幽默风趣	256
第十五章 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批评综述	262
一、肯定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作用	262
二、指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缺陷和不足	269
后记	276

第一章 新现实主义小说总论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以“三贴近”为创作原则，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刻的理性力量、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当下的话语立场，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和重大社会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生动地表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改变历史现状和生存境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拼搏精神，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本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并在创作中积极借鉴和汲取其他各种创作方法中的可利用元素，将其有机而深入地渗透到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中，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其以贴近现实、反映人生的创作倾向而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注意和赞誉，他们把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现实主义的重构”“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的回流”“现实主义的复归”等等。还给予了各种称谓，如“新社会问题小说”“体验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文学”，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称谓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些生机勃勃、弘扬正气的现实主义作品坚持“二为”方向和“三贴近”原则，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赞扬。所以，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也是时代精神和主旋律的冲击波，革命文艺传统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主义精神，延展和拓宽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之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因而表现出愈加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冲击力。可以说，它是世纪之交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现实主义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进入新世纪以后，新现实主义小说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作家的创作激情和“改良社会”的目的逐渐收敛到文学本体内部，更加注意用

审美的功能来取代明显的功利目的，题材范围逐步扩大，艺术手法逐渐拓展，主题意蕴愈加深厚，使得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没有减退和被其他的文学现象所替代，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

一、贴近生活，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始终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创作原则，直面现实，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坚持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热切关注国家、民族的现状和前途，深切关爱人民群众生活命运，深刻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进行改革的伟大实践，以多重的审美视角和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

新现实主义小说发轫于1995年，其标志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和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作品的发表。在1996年以后，随着河北的“三驾马车”在文坛的迅速崛起以及张平、周梅森、陆天明、柳建伟、张宏森等人作品的集束出现，形成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并产生了“反腐小说”“官场小说”“下岗文学”“打工文学”“新乡村小说”“贫困大学生文学”等多种文学形态，出现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车间主任》《抉择》《人间正道》《至高利益》《中国制造》《英雄时代》等一系列作品，成为透析历史发展境况、反映现实社会形态的一面镜子，也成了文学发展的主流。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并无理论的张扬，也没有官方的推举，更多的是民间和民众的认可。它在各种文学思潮和纷繁的文学式样的角逐中，于不经意间悄然崛起，迅速地填充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文学空间。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切入转型期的艰难而苦涩的社会现实，在深刻的理性中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结合起来，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融会成统一的文学话语，从而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末的语境中突然崛起，“它们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无掩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踟蹰中的突围，它们或写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写家庭化的私营企业，或写一角乡镇，全都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问题之复杂，以及给人的冲击力之大和触发的联想之广，都是近年来所少见。”^[1]

这些“作品充满了浓烈的当今实际生活的气息，表现出经济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勃勃生机，同时也写出了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痛苦和艰难。转型作品在这一段时间里相对集中地出现，不约而同地提示出相似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一定的阵势，掀起一股现实主义的冲击波。这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所传达的感情容量，突破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得失、悲欢，而表现出对我们共同承担的社会现实的真切忧思。”^[2]新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广大群众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创伤，让人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赎的责任，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了20世纪末的中国物欲膨胀、精神萎缩，物质进化、道德退化这个阻抑社会发展的巨大矛盾及产生的原因和危害。这使我们深刻认知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及如何疗救社会的弊病，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生活的厚度和精神的力度较之以往都有所增强，使之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过去有的作品显得促狭短视，缺少诗意的美感和史诗的厚重，现在这种缺憾经过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多年的心灵营养和艺术修炼之后已经有所改观，他们更加注意探寻人的心灵和时代的真相，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意识，创作出了一些内涵厚重、人物典型、充满诗意的作品，如关仁山近年来深入农村、关注“三农”，创作了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他说，自己之所以如此关注“三农”这个题材，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实际上我写农民也是写这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里农民的喜怒哀乐，人情变迁，命运史和精神史”。“农民是我们国家的人口主体，现在城镇化解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命运我们要给予关注。”^[3]何申的“乡镇干部系列”小说对乡镇干部美质的表现也在不断拓宽和深化，塑造了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镇干部，为新世纪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个鲜活动人的形象，使这些肩负“三农”重任的基层干部群体愈来愈受到读者的瞩目和欢迎。如《乡长丁满贵》中的乡长丁满贵，《女乡长》中的乡长孙桂英，《调解》中的乡调解员包德林，他们为民分忧、为民解难，与时俱进，认真践行上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成了社会主义新人，作者力图在这些人物的生命历程中注入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再如，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张平的《国家干部》《抉择》，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刘醒龙的《天行者》《圣天门口》，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谈歌的《激情年代》，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日

头》，何申的《田园杀机》、阿宁的《城市季节》《天平谣》等，就是具有丰厚时代意蕴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着眼点依然聚焦在时代的主旋律上，表现出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必然趋势。

无独有偶，与中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出现兴起的同时，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文学现象。1992年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卡连·斯捷班尼扬在《作为后现代主义终结期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肯定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因素有机而深入地渗透到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中，两种好像完全对立的艺术体系相得益彰。他称此为“新现实主义”。1993年著名评论家巴·巴辛斯基在《回归：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战性札记》一文中，也同样使用了“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并把当代一些作家归入其中。他们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应和。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谢尔盖·卡兹纳切耶夫发表《“新现实主义”和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认为应当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创作方法来看待。这样说来“新现实主义就是在当前的社会和文学语言发展阶段的现实主义”。同年，作家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发表《反对送葬》，提出后现代主义濒死。“在年轻人的小说中……重又感受到以前的传统文学。新现实主义！”之后，作家朗曼·谢恩钦又在莫斯科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声明《新世纪第一代文学》。声明中称：“我们文坛上统治了10年的后现代主义走向颓势……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辩护士在他们最近的作品中都失望地转入现实主义的轨道。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是20年前文学研究教科书上的现实主义，评论家给了它一个新的名称，虽然不是很合适，但姑且就用它一下——新现实主义。”2003年10月，他又在《文学的俄罗斯》报上发表《新现实主义者们》一文，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今日俄罗斯文学众多流派中的一个，它最年轻，也最具发展前景。一些评论家认为：“关于20世纪末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消息会唤醒文学生活。评论界在痛苦的沉默状态下长久地寻找合适的词语，现在看来这个词语找到了，就是‘新现实主义’。”^[4]在王守仁主编的四卷本《美国文学史》中明确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一部分作家在坚持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吸收、借鉴、消化实验主义小说的创作思想和方法手段赢得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称号。”陈彦旭的《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之概念与特征初探》也指出：“在多部‘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中都蕴藏着一股强大的道德回归与重建意识，体现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直面现实的勇气，对秩序的渴望和对人性的充分乐观与

自信。在美国新现实主义作家中菲利普·罗斯可以称得上开先河的一个人物。他的《美国牧歌》可称得上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高婷在《当代“伊甸园”的困惑——菲利普·罗斯新现实主义小说〈美国牧歌〉解读》中这样评价本书的作者：“他既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又吸纳运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实验小说的某些技巧，逼真再现了几代犹太移民美国梦幻灭的过程，表现出明显的新现实主义倾向。”^[5]

应该说，中国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与国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有许多相似和接近之处，它既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延续和拓展，也是对其他文学现象的纠正和反拨。它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统摄下，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完美结合，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相互融会，从而完成了世纪之交的文学从先锋到大众、从个人到社会、从调侃到关怀、从对生活表象的摹写到生活本质的开掘，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赞扬，写出了世纪之交中国的各个领域的真实境况。如反腐斗争，在《省委书记》中通过省委书记贡开宸这一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锐意改革、敢于同腐败做斗争，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扶持和提拔年轻力量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形象，全面、深刻地表现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远大襟怀。他通过“大山子冶金公司”的亏损问题追查，追寻出了以省委副书记潘祥民为首的腐败集团，深刻地揭示出了腐败之所以积重难返，就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成了腐败的根源，他们深藏在幕后，以道貌岸然的假象迷惑人们，只有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牺牲才能取得反腐败的胜利。《大雪无痕》则是塑造了方雨林、丁洁、廖红宇等普通群众的反腐来表现反腐败的艰巨性的，他们把反腐败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坚信如果反腐败从我做起，腐败就不会得逞，也才能使腐败失去权力的庇护，达到防止和根除腐败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群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腐败——这个最大社会问题进行殊死斗争，积极推进改革进程的无私无畏、性格鲜明的反腐勇士，给我们以前进的力量和信心，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前景，看到了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无限生机。再如农村改革，如《天高地厚》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自身命运的变化和精神世界的拓宽，真实地摄录了农民在社会进程中行进的沉重步履和心灵流变的艰难历程。作品以三个家族、三代农民的感情纠葛、命运遭际为主线，表现出了农民对家园土地的深切依恋、保护和开发，对悲苦命运的不屈、苦斗和奋争，深刻地揭示出了古老的土地在今天巨大的历史变革中所显现出来的内蕴：传统意

义的农民和传统方式的农业正在减少和消失，新一代的产业农民和立体农业、绿色革命正在形成和兴起。这就是中国农民和农业的范式和走势。作品集中塑造了有理想、有抱负的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国农民的美质，鲜明地体现了农民的理想和要求，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日头》生动地描写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诡云谲的巨变，通过金家、权家、汪家、杜家几代人错综复杂、交缠纠结的关系图谱，鲜活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北方农村斑斓多彩、震撼心魄的生活画卷，表现了传统乡村文明逐渐瓦解的过程和新的乡村文化建构的艰难历程，是“乡村中国的深度书写”。如《日头》获2014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后的评语中所说的那样：“《日头》是对中国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次完整的艺术呈现。在艺术上，作者将现实的探寻与精神的漫游、物质的批判与文化的想象、正史的端庄与野史的奇异有机结合，使小说焕发出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为乡土中国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在世界文学语境中与其他国家的新现实主义作品遥相呼应，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并方兴未艾。因而，这需要对中国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在更深层面、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细密梳理和全面归结，以及较为完备的理论阐释、科学论定和体系建构。这不仅会给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续写提供重要参照，使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开拓和创新、深化和发展，同时也会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贴近群众，与人民“分享艰难”

新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出了一种浓重的与人民群众“分享艰难”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的延续，也是在20世纪末这个历史转型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社会新质的文学品格。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精神范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民族、地区有着不同表现，但也有一个恒定的要义和普遍的标准。周国平教授在国家行政学院的讲演中曾这样讲：从通用的角度讲，“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

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着,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以文为魂。人文精神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人性力量、文化素质、人类文明的具体表现。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人文精神。因此,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实践中积极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使人的价值得以全面体现。也就是说人类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使之从“自在”的状态发展到“自为”的状态,从而成为一个人文素质不断发展、人文力量不断增进、人文精神不断提升、人文内涵不断丰富全面发展的丰富的人。

在 20 世纪末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对于所出现的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贫困大学生、打工者这些弱势群体,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体现出了“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整体思考”,^[6]用作品温暖着那些被人冷漠的弱势群体的心灵,给他们以精神的抚慰,并发出了发自肺腑的心声。如同谈歌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和‘大锅饭’,使企业进入市场经济的漩流中,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使工矿企业和工人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我写这些小说,对于他们的困难、烦恼以及欢乐,我不吐不快。”^[7]胡学文也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心灵的疼痛和疗救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它发现苦难和不幸,并通过诗意的手段,帮助人们超越苦难,摆脱不幸,最终获得内心的解放与安宁。”^[8]对于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这种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情感向度,有的评论家这样赞誉道:“这类小说之所以能够以情感人,与作家们对待生活与艺术的认真态度有关。他们绝不游戏生活,绝不草率轻狂地玩弄艺术,无意奢求脱离生活背叛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个人价值与自我,而只是甘愿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他们休戚与共,为他们代言。……乐于对处于困难之中的普通人给予‘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进而去发掘‘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对于无私分享艰难的‘大善’进行热烈但又蕴藉的讴歌。”^[9]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首先将关爱的目光投放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未获得应得利益却受到伤害的人们的身上,正视和同情他们的不幸,给了他们精神的抚慰和正义的伸张,为他们

鼓与呼。关仁山认为：“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不能丢掉中国农民。”他作为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对当下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度探寻和思考。谈歌认为，在目前的社会境况中，“当代中国的作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更为艰巨，我们应该也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正是这份与人民分享艰难的浓厚感情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书写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热切关注他们的苦痛。如《抉择》中在中纺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老劳模穷困潦倒，住在 50 年代的小平房里，还有好多工人病了连药都买不起，他们的孩子连学也上不起，甚至连工资也得不到。谈歌的《大厂》中的“小魏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要做手术”，却无钱医治；《年底》中的披肩发的女人的丈夫被车撞断了腿“在医院躺着”“厂一年多不开支”，只好去陪舞挣钱。对这种生活现状，群众愤懑不平，困惑不解。如《年底》中车间主任老吕曾叹道：“这改革越改越不像话了，改得工人医药费医药费报不了，工资工资开不了……我真是想不透。”作者不仅正面揭示了下岗的原因，也对下岗工人给予极大的疼顾和关爱之情。如作者所说：我的作品“是为工人而写作的”。应该说，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同机制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些不平衡，这也就必然给生活在底层的群众带来物质和精神的一些不平衡。他们与白领阶层、企业主、名歌星影星们的生活距离愈拉愈大，甚至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下岗失业、打工受雇佣在他们那里随时都成为一种可能，不得不饱尝被人歧视和损害的包身工的滋味。作家们对此表示出了深厚的悲悯之情，并将这种情感灌注到作品中，呈现出哀伤和凄楚的色调。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写的是为了不使工厂破产，厂领导让李小水等有姿色的女工学习“三陪”，强装笑颜去迎合港商的卑劣要求，反映了即将下岗的工人苦不堪言的现状。关仁山的《太极地》里合资企业中的工人因受外商侮辱而联合起来反抗时其结果是中国民工向外商赔罪，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再次上演包身工的悲剧。何申的《奔小康的王老祥》中 10 年前村干部因吃喝欠银行的款却硬性栽到簸箕沟 10 户村民的头上，使他们被迫去应诉，结果是法院判村民败诉，反映了时下的农民饱尝艰辛、不堪重负的境况。

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展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窘迫，也展现了他们高尚的人文情怀。如谈歌的《人生在世》描写了一些下岗工人所显现出来的积极奋争、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表现了人的命运无法选择，但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刘大龙、牛子、郭秀敏等下岗工人以

坚忍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创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条新路，提升了自己命运的价值。表现出了“人生在世”不容易，活好活坏在自己的这一人生道理。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是在困境中站起来挺直了脊梁的“硬汉”。作品中交织着亲情、友情、爱情的酸甜苦辣，流溢着人性、人伦、人欲的复杂情感。正是刘大龙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下岗工人，一方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的困惑和折磨，另一方面又默默地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重轭，艰难跋涉，奋力前行，较之那些庸俗和腐败的“肉食者”不知高贵了多少倍。如谈歌的《老同学三篇·张建国》中表现了曾是大学毕业具有副高职称和当过副厂长的张建国在工厂破产以后，谢绝了他人的帮助，神情坦然地先是靠拉三轮后又又在大街上擦皮鞋生活，不给国家也不给他人添麻烦。正是这样，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基层群众下岗后的苦痛，更多的是在这种苦痛生活中的人们与国家和人民分享艰难与命运抗争的伟大精神。再如胡学文《透明的悬崖》中的小饭馆老板杨苗，在底层的生活艰苦奋斗中，用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尽全力看护好家乡出来打工的女孩子们。虽然一次次被伤害，但仍用自己的善良厚待他人。《极地胭脂》中的唐英以宽宏大度的态度应付他人的自私、狡猾，以勤勉敬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她将金钱看得很淡，将工作看得很重。她精于医道，深责自己工作的失误。她拒绝名利，拒绝世俗，甘愿在底层当兽医。这些作品既让我们看到了世俗现实世界的强大，也看到了底层人物人性的光芒。他们的这种行为更多是出于人性良知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尤其是刘醒龙的《凤凰琴》《天行者》都是以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为背景，生动真实地表现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灿烂的人性光芒，他们成了“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凡读过这些小说的人，无不作家笔下乡村民办教师们质朴坚忍、无私忘我的生存毅力和精神品质所深深感动。尽管这些民办教师都冥思苦想地想转正吃皇粮，竭力摆脱“民办”的桎梏，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转正而放弃自己的神圣责任，而是如牛负重般地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心甘情愿地担承着“身为人师”的教化作用，生动地表现出了民办教师身上伟大的人文情怀。

这种分享艰难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这些普通百姓身上，更表现在一些领导者的身上。基层领导者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者。在社会大环境失调的今日，他们的为官也是一种承受精神苦难和解决人民疾苦的艰难历程，甚至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和精神涅槃的过程。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们企望在国家、民众和个人之间找到一种妥协和共识，

以化解困难，走出困境，但在现实的社会环境里，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或一步到位的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有时只能以他们的牺牲才能唤起民众，激扬民族弱化的心灵。如谈歌的《城市》就充分显现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市长杨海民和副市长方与林虽有很深的宿怨，但为了解决全市下岗这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焦点问题，俩人齐心协力，为民解困。在《城市行为》等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各级领导干部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下岗”这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透视，并渴望找出某种解决的途径，给人以精神的感悟和启迪。尽管这是一种情感式的方式，但作者的热望和期盼感人至深。这些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唤起人们对社会共同的根本利益的体认，以凝聚起风雨同舟的社会情感。作者在告诉我们，在社会转轨时期，我们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但人间真情不能丢掉。“人爱人，人帮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我们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只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保持和发扬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抑制市场经济带来的病毒，也能使企业摆脱困境，走向辉煌。关仁山《破产》中的副镇长高德安为了拯救濒临倒闭的城北轧钢厂，东奔西跑，化缘集资，力图扭亏为盈。他见到工人们为了救住院的孩子，有的去陪舞，有的去卖血以筹措治病的钱时，心如刀绞。他倾尽全力，以身殉职，但终未能挽救工厂破产的命运。因为破产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环境的失调，最主要的症结是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困境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消除的，但是这种实践主体在严重矛盾斗争中显现出来的强烈道德倾向和精神力量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

这种牺牲精神还表现在这些基层领导者对丑恶行为的被迫屈从和妥协上。他们置身于公共领域中，力图以多方面的沟通来化解矛盾，寻找凝聚团体的共识。可他们不是一呼百诺的改革英雄，而是置身于世俗社会中的现实人。他们无法把自身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强加于人，而只能立足于当下集体发展的现实利益。所以在他们的身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精神也被裂变为双重状态：一方面他们要以人格的力量和牺牲精神感召群众；另一方面为了企业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屈从丑恶。《大厂》中的吕建国为了订合同，客户“要什么”就陪他们干什么，甚至客户因为嫖娼被关押，他还要托人弄脸去赎人。尤其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为了保住全镇经济不崩溃而不得不放过强奸他心爱表妹田毛毛的企业家洪塔山，最后他只能跪倒在受害者面前乞求原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呢？对丑屈从，对恶妥协，这种被迫无奈的结果使他们的心灵遭受了巨